

新中国

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研究

(1953—1965)

XINZHONGGUO

JINGJI

FAZHAN

ZHANLUE

ZHONGDA

ZHUANZHE

YANJIU

● 储成仿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

XINZHONGGUO
JINGJI
FAZHAN
ZHANLUE
ZHONGDA
ZHUANZHE
YANJIU

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研究

(1953—1965)

• 储成仿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研究:1953~1965/储成仿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5

ISBN7-81052-528-X

I. 新… II. 储… III. 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国—1953~1965 IV. F1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142 号

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研究(1953—1965) 储成仿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开 本	850×1168 1/32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 张	8.5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字 数	200 千
责任编辑	朱寒冬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1052-528-X/F·58

定价 13.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 言

放在眼前的这本专著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又是安庆师范学院主持的安徽省重点学科《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设的系列之一。1996 年秋天刚进入人民大学不久，我便与我的导师杨先材教授讨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论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个论文选题，是以政治为主线，把毛泽东和刘少奇建国后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意见划分为分歧的发端、分歧的扩展与分歧的激化三个阶段，试图从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以及阶级斗争等四个方面的认识偏差来分析、探讨和挖掘“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根据我的这一研究状况，杨老师建议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换一条主线，把研究的重点放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上来。经过思考，我同意了杨老师的建议。当时，杨老师正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室务委员、第二研究部主任。

把建国后“文革”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这个题目很有特色，学术价值很大，但同时难度也很大。

首先，这个选题看上去既像一个建国后中共党史的选题，又像一个新中国经济史的选题，还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史的选题。但仔细一瞧,这个选题的内容所涉及的既不完全 是建国后的中共党史,又不完全是新中国经济史,更不完全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它是三门专史的结合,其目的是通过把 三门专史结合起来,研究始于“一五”计划的制定、终于“文革” 发动前“三线建设”的初步实施这样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 最高层关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决策的演变史。这就是 这一选题的特色。

其次,这个选题的学术的以及现实的价值在于,把三门专 史结合起来研究始于“一五”计划的制定、终于“文革”发动前 “三线建设”的初步实施这样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高层关于 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决策的演变史,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尝 试。这个尝试试图从新中国经济史这门专史中选择一个专题 来加深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同时又从中共党史出发、试图站在 党中央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宏观决策的高度、从经济发展战 略的角度,整体把握和探究始自“一五”计划、终至“文革”发动 前这一时期的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以便在学理上为这段 历史构建一个独特的诠释构架。另外,整体性的经济发展战 略演变过程的研究建立在单个问题的研究之上,它避免了单 个问题研究的局限,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清单个事件的来 龙去脉,从而能更真实地再现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以达到在 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总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目的。

再次,由于这个选题是个初步尝试,因此难度较大。其表 现在,第一,要弄清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的特定内涵,并确 定什么是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起点战略;第二,以往在我国 经济学界,人们大都把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转折当作同义

词或近义词来使用,但在这个课题里,我们必须把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转折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否则我们就不能把建国后“文革”前这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所发生的次数划分出来,因此,也就无法展开对建国后“文革”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这个课题的研究;第三,为了正确评价这段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所发生的几次大转折以及相关问题,同样需要研究者作出细致、深入、客观的分析和判断。

面对以上种种难题,本书第一章导论部分首先选择“经济发展战略”这个概念为分析问题的切入口,循着这个切入口,尝试搭建一个诠释这段历史的基本构架。

什么是经济发展战略?从一般意义上讲,经济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在较长时间内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重大措施。由此可见,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其最关键的是这一发展战略的目标的确立。社会经济这一阶段的发展战略之所以不同于下一阶段的发展战略,其根本点是这一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与下一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不同。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划分经济发展战略是否改变的依据,是看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否改变了,至此,我们初步确立了经济发展战略不同阶段划分的一般依据或标准。

那么,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折又有什么不同呢?通过考察,我发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1.随着上一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完成,下一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是上一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延续、推进

或拓展;2. 下一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与上一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同一发展轨道、同一发展方向。经济发展战略转折则与此恰恰相反。当一个经济发展战略发生转折时,1. 下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对上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中断,而不是上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延续、推进或拓展;2. 下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从本质上否定了上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从而脱离了上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运行轨道,偏离或朝着与上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相反方向运行。

根据上面对于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与经济发展战略转折两个概念的区分,建国后“文革”前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的演变史,实际上是始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终止于1965年“三线建设”的启动这样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关于中国经济建设重大决策的演变史。对于这段历史,我的研究所得出的诠释构架是:1953—1965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起点,先后经历了赶超战略、均衡发展战略以及备战战略三次大转折。在这一时期内,中国经济建设的主旋律是偏重发展重工业。围绕着这个主旋律,均衡发展与畸形发展相互交替,急躁冒进与循序渐进接连而生。从“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大跃进运动,到三线建设,形成了一条急躁冒进、畸形发展的线;从“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到八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到调整与继续调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的提出,形成了另一条循序渐进、均衡发展的线。这两条线犹如一把琴上的两根弦,紧扣着偏重发展重工业这个主旋律,一时循序渐进、均衡发展压倒了急

躁冒进、畸形发展,一时急躁冒进、畸形发展压倒了循序渐进、均衡发展,演奏出了一首发人深省的二弦变奏曲。

在这一诠释构架中,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探讨,这就是如何从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与转折的角度看发生在“大跃进”运动中的“八个半月纠左”这一历史事件。在我看来,“八个半月纠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折的可能,但没有实现战略转折。其原因是:第一,“八个半月纠左”是在坚持“左”倾指导思想、坚持“大跃进”前提下的纠“左”,因而很难实现否定以赶超为目的的发展战略的根本转折。第二,“八个半月纠左”过程中,各项指标得不到有效控制,仍然居高不下。第三,“八个半月纠左”没有能够扭转各种比例失调,“大跃进”运动带来的混乱状况也未能得到有效治理。庐山会议本来可以成为实现战略转折的契机,但由于庐山会议后半段从纠“左”向反右逆转,结果使“大跃进”运动在1960年变本加厉,其造成的灾难更是雪上加霜。由此可见,“八个半月纠左”既不是上一个发展战略在下一阶段的进一步转变,也不是对上一个发展战略的中止、否定或转折,这一历史阶段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曾经一度造成了战略转折的可能但又未能实现转折。

如何认识中国的工业化以及“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是本书第二章所要探讨的重点问题。

第一,关于工业化的概念以及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对于工业化的概念,我主张从器物、体制和观念三个层面的结合上来把握,即: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机器大工业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逐步确立了主导

地位。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深入发展直至运用于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传统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现代的工业国。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精神文化观念都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至于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尽管中国工业化思想主张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所受刺激而兴起的洋务运动,但严格说来,最先提出要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这一宏伟目标并同时创造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前提条件的,是中国共产党。因为,一个国家要实行工业化就必须具备三个前提条件,即:这个国家必须是独立的而非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是统一的而非分裂的、是稳定的而非动乱的。鸦片战争后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间内,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四分五裂、军阀混战状态,因此不论是晚清、北洋军阀还是民国时期,都不具备实行工业化的前提。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一个独立、统一、稳定国家的兴起,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前提的造就,因此,我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不应是晚清政府操办的洋务运动而是“一五”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第二,中国工业化为什么一开始会采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我认为,这是当时中国经济建设理论与现实的必然选择。从理论上看,中国工业化道路从一开始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是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与列宁进一步归纳和发展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密切相关。从现实看,在东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垒下,中国的工业化只能以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为样板。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朝

朝鲜战争的爆发加速了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形成。

第三,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战略由于其内在和外在的必然性最终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但这并不等于说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内部对这一发展战略的选择都持完全一致的意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认为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是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对于这一点,本章作了相应介绍。

第四,关于“一五”计划的实施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形成的关系。本章认为,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一五”计划时期,也是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建立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与以下几个背景因素直接相关:一是受以往几千年农业社会形成的自然经济思想的影响;二是受过去 20 多年革命根据地和军分区处于被包围、被分割的农村情况下形成的自给自足、各自为政的管理制度,以及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的影响;三是思想上受社会主义就等于计划经济观点的影响;四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搬用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五是为了适应朝鲜战争的需要;六是为了适应“一五”时期集中主要力量进行重工业为主的重点建设的需要。

第五,基于以上分析,本章认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所固有的弊端,在“一五”时期就暴露出来了:这种体制不适应国有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的要求,束缚了企业的积极性;由这种体制造成的条块分割状态,割断了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这种体制容易造成基本建设投资膨胀,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这些又反过来导致经济发展低效益等不良后果。

同时,“一五”前后我国经济建设所出现的问题以及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也给后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一是战略目标的制定要以现实的可能为依据;二是保证重点、均衡发展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成长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三是必须合理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把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四是必须注重经济核算,把提高经济效益放到生产建设的重要位置。

本书第三章着重分析赶超战略形成的原因以及演化过程,认为,作为赶超前奏的建国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速度的步步加快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四次意见及思想分歧或四次争论同步发生的。这四次思想分歧是:第一次发生于1950年春,是围绕东北富农问题展开的。第二次是由于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写的一个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引起的。第三次发生于1953年。第四次发生于1955年,是围绕着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展开的。

赶超战略的制定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所共有的赶超意识密切相关的。赶超意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快速工业化意识。第二,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条件优越性意识。第三,强烈的借鉴学习意识。从历史演变的过程看,赶超战略的确立是以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标志。继“反冒进”之后接连发生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7年9—10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1957年11月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几个历史事件,使以社会主义建设总

路线为基本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赶超战略得以最终形成。

赶超战略是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否定和中断,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速度;第二,指标;第三,比例。在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人民公社这个组织形式,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实现大跃进、同时为了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产物。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在大跃进运动之中,由此可以断定,大跃进运动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直接导因;但是,人民公社这个社会基层组织形式一旦确立,它又反过来作用于大跃进运动,由此可见,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大跃进运动是火上加油。

大跃进时期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否定了“一五”前后建立起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第一,中央计划权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第二,计划程序改为自下而上地逐级编制;第三,建立协作区,实行三级计划管理体制;第四,实行“双轨制”的计划体制,把它纳入为大跃进服务的轨道。

赶超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惨痛的:第一,经济建设和计划工作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第二,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第三,经济建设必须处理好速度与比例、效益的关系;第四,经济决策必须科学化、民主化。

本书第四章研究的是均衡发展战略。畸形发展的赶超战略的实施,给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严酷的经济现实迫使党中央领导人不得不停止“大跃进”,转而采取均衡发展战略,以挽救实施赶超战略所造成的重大损失。正是在这一特定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大调整。

调整国民经济决策的提出,标志着赶超战略的中断和均

衡发展战略的开始。均衡发展战略否定了赶超战略,从而实现了1953—1965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次重大转折。

均衡发展战略否定赶超战略首先表现在党中央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变化上,同时还表现在对赶超战略的战略重点的改变上。为了把国民经济纳入一条均衡发展的轨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认识到了制定规章制度的重要作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农村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等项条例,以此来控制由于实施赶超战略所带来的危害,努力把国民经济引上一条均衡发展的健康轨道。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为了实现赶超,大搞群众运动,搞“一平二调”,搞供给制,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其结果导致经济效益低下,经济秩序极度混乱。1959年3月下旬,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为了适应调整的需要,我国计划管理体制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次调整的总特点是强化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这一期间计划管理体制调整和完善的主要内容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扩大中央计划决策权;第二,加强中央对经济的宏观控制;第三,实行在中央集中领导下,“条块结合,以条条为主”的计划管理体制以及恢复实行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计划管理体制;第四,注意利用和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

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给我国的经济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

的经验:第一,正视现实、实事求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大转折的前提;第二,加强综合平衡和宏观控制,是搞好经济调整的根本办法;第三,经济计划管理体制必要的集中统一,是实现调整方针的重要保证;第四,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第五,重视提高经济效益;第六,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小调整,才能避免大调整。

本书第五章集中探讨备战战略的形成过程和实施的利弊得失,认为,抛弃“吃穿用计划”转而全力投入三线建设,是与毛泽东对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局势以及战争危险过于严重的判断紧密相连的。战争一触即发的判断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决策。“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本来可以继续调整之后把国民经济引上一条正常、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战争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从而使备战战略取代了均衡发展战略。

备战战略否定均衡发展战略集中表现在战略重点的转折上。备战战略的制定,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过于严重的判断,另一方面是鉴于苏联卫国战争中乌拉尔以东工业基地虽然建得迟了,但也发挥了较大作用的经验教训,因而决定改变工业地理布局,首先集中建设大三线,以此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备战战略实施过程中所采取的另外一大举措,就是工厂大搬迁。随着备战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中国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又开始了第二次放权。其表现在:第一,扩大地方的计划管理权;第二,扩大地方的基本建设管理权;第三,扩大地方的物资分配权。

不可否认,我国工业建设在三线建设时期也取得了一些

成就,这些成就是:第一,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企业;第二,形成了若干新的工业中心;第三,更新了三线地区的工业面貌。但三线建设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是:第一,建设计划不当和不配套;第二,建设程序混乱和选址失误;第三,外部环境差和生产成本高;第四,片面强调生产而忽视生活福利。

实施三线建设虽然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很多,但主要的教训是:第一,对于战争的威胁要有一个合乎客观实际的估计;第二,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工业建设必须计划周密、量力而行;第三,必须恰当调节工业地区布局中的国防战备要求与经济合理性之间的矛盾,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等因素,因事制宜,区别对待。

本书第六章总论如同本书第一章导论一样,是一个概括、总结性的研究,主要探讨了1953—1965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几经转折的原因以及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认为,1953—1965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几经转折的原因大致有三:第一,偏离实事求是的探索是1953—1965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几经转折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重心的经济发展战略本身从一开始就隐含着导致积极分子起落跌宕的潜因;第三,经济工作的过度政治化是1953—1965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几经转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953—1965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几经转折的历史给我们正在推进的工业化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教训:第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尤其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经济建设健康、持

续、稳定、高效发展的根本前提。第二,坚持均衡发展、稳步前进,摒弃只求速度、“单兵独进”是经济建设健康、持续、高效发展的先决条件。第三,落后国家要想跟上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步伐势必实行赶超,但在实行赶超的同时必须彻底跨出赶超战略的陷阱。第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法制化是经济建设健康、持续、高效发展的根本保证。第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作经济发展战略重大决策时,对于国际局势应有一个客观估计,对工业内部结构以及地区布局应有一个合理安排。

以上是本论著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构架。对于这个课题,本论著所做的仅仅是一些初步的、粗线条的探讨,很多细致的、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的挖掘。值得欣慰的是,我的这部引玉之作,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终于能够付梓面世。在此之际,首先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杨先材教授对这篇论文所作的指导、帮助和修改。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王顺生教授、罗正楷教授、陈明显教授、张同新教授、黄嘉树教授、温乐群教授、王东教授、周大计教授,中共中央党校范守信教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刘友于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周鸿教授,在我的论文评审、答辩过程中付出了大量劳动;安庆师范学院对于本论著的出版给予了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英文摘要 (ABSTRACT)

Eith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or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s Economy ,it is a new and valuable attempt to research on the great strategical turn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1953 to 1965 . This attempt tries to choose a special subject from the special history of economy to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PC ,at the same time , tries to grasp the whole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to the outbreak of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both at the height of the macro policy - decision of the Party's leading new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 Study of the whole process is established on the base of study of individual problem ,it will avoid the limit of an individual problem and help us to see the beginning and subsequence of the individual event more clearly . The true colour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ill be shown and from it experience and lessons will be drawn at a deeper and wider level .

The main points of Chapter 1 of this thesis are :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means both some important targets